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理论述评

李飞龙

(贵州财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阳 550004)

摘要: 近年来,在当代乡村史研究的过程中,学界不断探索解读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并逐渐形成了多种乡村史研究的理论视角,主要有传统和现代理论框架、“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日常生活史视角、基层社会研究视角、社会延续和历史长时段视角、整体史观视角等。而对当代乡村社会史的理论视角进行系统总结,将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化。

关键词: 当代;乡村史;理论;视角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12)01-0127-04

在乡村史研究的过程中,科学的理论视角十分重要,它不仅能够帮助研究者开拓思路,还可以使研究对象的特点更加突出。近年来,在当代乡村史研究的过程中,学界不断探索解读乡村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逐渐形成了多种乡村史研究视角。

一、跨学科研究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

跨学科研究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是当代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和主导趋势,这也是中国当代乡村史研究的鲜明特点。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方法进入到当代乡村史研究领域,使乡村史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

鉴于社会学和社会史的天然联系,寻求其关联点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有学者利用个案的实证材料研究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与人口生育,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普遍多育的表象下面涌动着节育的要求,生育意愿的代际差异逐渐呈现。^[1]有的利用大量的地方志材料对集体化时期农村人口的流动进行了分析,认为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仍然流淌着人口流动的涓涓细流。^[2]

以人类学的视野来解读乡村社会,是乡村史的重要研究取向。人类学由于自身的学科性质和特点,似乎天然地就和乡村有着不解之缘。有的学者研究了皖北农村的李村后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过

程中,传统的宗族意识、宗族功能和制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它仍然以潜在的形式延续着。^[3]^[6]有的学者对村庄的礼物交换体系和人际关系模式进行研究,阐释了中国礼物交换系统的特征,探讨了在中国文化中道德规则在关系和人际行为中的复杂性,论述了礼物经济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4]

从法律社会史的视角来解读乡村社会,也是近年来乡村史研究的趋向之一。有的学者在整理松江县和奉贤县民事案件的基础上,指出在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的民事案件中,离婚案件占据着民事案件的绝大部分,不过绝对量不高,进而强调农村社会法院的调节程度和调节方式是农村社会低离婚率的重要原因。^[5]同时,通过对东南沿海抽样所得的45例离婚案件的分析,认为从毛泽东时期的主要由审判员调查取证变为今天主要由当事人举证的制度,同时导致了一系列未预后果。^[6]

此外,环境史视野下的乡村社会,也是乡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许多学者逐渐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历史演变中的一个重要变量,重视考量生态环境对于社会变迁的历史作用,生态学取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二、当代乡村史研究的中层理论

在当代乡村史研究中,如果说将社会学、人类

收稿日期:2011-07-02

作者简介:李飞龙(1981—),男,江苏东海人,贵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学、法学、生态学等相关的理论应用于实际研究中,难免显得过于宏观,而默顿主张的中间层次理论在当代乡村史研究中或许更为适用,这种处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层理论是社会理论“实用化”的桥梁,指导着人类的经验实践,特别是实地调查。

(一) 传统和现代理论框架。关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焦点之一。希尔斯认为:“几乎任何实质性内容都能够成为传统。人类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畴,所有的信仰或思维范式,所有已形成的社会关系范型,所有的技术惯例,以及所有的物质制品或自认物质,在延长的过程中,都可以成为延传对象,成为传统。”^[7]^[21]按照他的理解,精神、制度、物质,只要是能延传的,都可以划入传统的范畴。而现代则是与传统相对应,标志着当前时期特征的一种文明形式。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性是一个包罗万象、多阶段、多层次、动态的社会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今天的现代到了明天可能已成为传统。

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理论产生之时,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将两者的关系极端化的倾向。当然,这种倾向很难解释传统的文明和现代化相融合的历史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研究者已经用实证和理论证明: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两个极端,在任何社会中既不存在纯粹的传统性,也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8]^[21]这一论点在王铭铭^[9]和唐力行^[10]的研究中也得到证明。新的认识框架对当代乡村史研究中的诸多现象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比如,越是经济发达的农村,农民越注重婚姻的传统礼节,越是农村现代化程度高的地区,宗庙和祠堂反而修建的越多。

(二) “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国家权力在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和最初运转中扮演了指挥、管理的重要角色。国家政策的推行过程,也就是国家权力从中央到基层得到强化的过程。^[11]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利用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全面控制了乡村社会,形成了典型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持续数十年之久,“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都是国家权力和国家意志的直接表现,此时的民众对国家权力有种强烈的附属感,未能形成对国家权力相应的制衡。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农村自治组织的不断建构,农村社会的宗族势力也日渐强大,农村社会开始逐渐成为能够和国家对话的独立载体,“国家与社会”互动范式在乡村社会中正逐渐形成。

“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的发展路径与上述实践基本吻合。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国家与乡

村社会”关系是“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在乡村社会的应用与发展。早期的国家与乡村社会研究,或者强调国家政策的作用,或者倾向于民众的力量,或者着眼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而现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开始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均衡地强调两者的作用。特别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出现,开始批判那种“自上而下”的一元性“国家”分析范式,构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性“国家和社会”互动范式。^[12]^[2]这也标志着“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的日臻完善。

(三) 日常生活史视角。日常生活史研究在考察乡村社会时,重视研究对象的微观化,采取“目光向下”的观察角度,它的研究对象包括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并且强调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他者”立场。^[13]这些研究方法正是乡村史研究所必不可少的。近年来,日常生活史研究日渐为学者所重视,孙立平指出,“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强调……不是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看作是一个完全自主的领域,而是看作普通人与国家相遇和互动的舞台。因此,我们……强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的均衡和整合”,^[14]美国学者怀特也认为,“要理解惊人的事件,就必须联系日常的生活模式来认识它。”^[15]^[7]黄宗智还特别强调,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16]

不过,目前对农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视角和方法都还比较单一,代表性的成果也比较少。实际上,日常生活就是每个人正在经历和即将经历的生命过程的共同特征,即生老病死,这方面可挖掘的内容十分丰富。比如“生”的含义,一是生存,在这个意义上它包括了村庄中的村民与其家庭成员为了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所采取的所有行动,二是生育。^[17]这两种解释都是乡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前者所讲的饮食起居是最能反映农村生活水平的标尺,也是分析农村收入和消费的重要标准;后者对于家族的绵延相连,以及父母和子女的互动和代际关系都息息相关。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农村中制度对农村的规范、限制与约束,需要研究者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和事件背后的故事,从“走向民间”角度考察乡村社会的基本情况。

(四) 基层社会研究视角。基层社会研究也是当代乡村史研究的重要视角。伊格尔斯在《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中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18]序言。在学术研究中,基层农村社会研究已经初步形成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新范式。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学者就已经

开始农民调查和农民研究了。例如社会学家李景汉、费孝通的理论著作;国外也有大批的学者在中国从事农村基层社会的研究,如波特夫妇、弗里德曼等。这些调查研究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农村,国外的研究成果显得更为成熟,上世纪60年代,简·迈德尔和昆·凯瑟尔到陕北的柳林村进行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出版了《一个中国乡村的报告》,该书是关于柳林村村民生活变革的民族志记录。^[19]1973年迈德尔又出版了《中国:继续革命》一书,记录下了柳林村“文革”的经过。^[20]此外威廉·韩丁的《深翻》,弗里曼、毕克伟和赛尔登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和《毛时代之后的中国家庭》,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都是基层社会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乐天的《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等,前书从普通农民的生存方式切入,展示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浙北小社区的基本生存方式,后书是对浙北当代乡村社会的全面解读。不过,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国内学人的不断努力。

(五) 社会延续和历史长时段的视角。在当代农村社会的研究中,学界关注的主要是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而实际上,中国农村的社会和文化具有相当深厚的延续性。改革开放后,波特夫妇在广州曾埠田野调查之后,认为建国后虽然有很多表面上的流动和变化,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显著的延续性。婚姻的模式有一些改变但不是根本的改变;家庭和宗族的形式仍然保持了原来的样子。^[21]

在当代乡村社会史的研究中,需要强调历史的延续性,应用长时段的方法,分析农村社会的基本情况,以打破习惯上将当代乡村史划分为几个阶段的做法。为此,很多著名研究者都发表过意见,布罗代尔曾指出,“杂事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各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22]^[27]勒高夫也认为,“历史的发展时快时慢,但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却只在长时段中起作用 and 可被捉摸。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只能是慢吞吞的”。^[23]行龙强调,“社会史研究要重视长时段分析方法,要打通近现代史的分期框架,将中国社会史研究下延至集体化时代,注重现代社会史的研究”。^[24]目前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是这一视角下的代表作,该书重点论述了黑龙江下岬村长半个世纪私人生活领域的变与不变。^[25]

(六) 整体史观的视角。“整体史”观盛行于20

世纪末,反映了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的变化,即世界的整体性和全球化趋势,这种全球化趋势必然反映到学术研究领域。在当代乡村社会史的研究中,如何将具体与抽象、微观与宏观很好地衔接起来,正是学界所面临的问题。

从当代农村社会的状况看,整体观所倡导的从整体把握、观察和研究事物的思想,符合目前的研究现状和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这不仅因为组成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相互关联,而且中国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恒定因素,这些变化不大的生活习惯和细节将帮助我们把握农村社会的整体状况。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需要“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实际上,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农村社会中生产、消费、婚姻、家庭等各个具体部分,才能更清楚、更准确地认识各个部分以及部分与整体的关联,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当代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

三、当代乡村史研究理论的瓶颈与前景

在当代乡村史的研究过程中,需要打破理论应用的瓶颈。当然,不足之处正是以后努力的方向所在。

首先,避免模式化。将大量的理论应用于具体的问题研究中,是可以给研究的问题提供一个解读的视角,但是这种理论应用也容易走向模式化的极端。模式研究,就是试图通过运用某一种理论模式概括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释普遍的历史现象,描述历史的基本进程,甚至预设历史必然的发展方向。同时这种模式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容易使研究对象教条化,使复杂问题简单化,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也极易走向单一。比如当代乡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如果只用“强国家、弱社会”的思维框架来理解政党、国家和农村社会的关系,就极易简单化。历史发展的线索是多元的,研究者只有以开放的心态,持多元取向,有更多的宽容性,才能将学术研究引向深入。

其次,避免囫囵吞枣。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的理论大多来源于西方,是西方学者根据本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解释框架,部分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我们将其拿来使用时,要注意其实用性。比如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社会有广泛的市场,也有很多学者将其作为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的理论框架,但是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是否适用,还存在着争论。同时,更多的研究者,尤其是初学者,容易囫囵吞枣地将理论套用于研究对象之上,有时并没有真正理解,容易造成对研究对象的误读。

最后,避免极端化。当代乡村史研究终究是属于历史学范畴,很多学者认为对研究对象进行界限划分是不科学的,但是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乡村社会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首先是需要研究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运行状态、农民生活的基本图景,以及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的使用等,需要向读者展示农村社会的基本的状况,需要在努力还原历史真相的前提下,进行理论提炼。比如,在当代乡村中医史研究中,要尽量避免将历史上的疾病作为中医理疗的案例来研究,解剖具体的个案,这是中医学的研究领域,而历史研究是在研究疾病种类的过程中,探索其中所反映的国家与民众关系以及社会变迁。因此,乡村史研究不是将其作为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的纯理论研究,需要避免当代乡村史研究理论的极端化。

参考文献:

- [1] 郑卫东. 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与人口生育——以日照市东村为中心(1949—1973) [J]. 开放时代, 2010, (5).
- [2] 游海华. 集体化时期农村人口流动剖析——以赣闽粤边区为例[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3, (3).
- [3] 韩敏. 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 [4] 阎云翔. 礼物的流动: 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5] 黄宗智. 中国乡村研究(4)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6] 黄宗智 巫若枝. 取证程序的改革: 离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实践[J]. 政法论坛, 2008, (1).
- [7] 希尔斯. 论传统[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8] 周晓虹. 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9] 王铭铭. 现代的自醒——塘东村田野考察和理论对话 [A]. 潘乃谷, 马戎.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中) [D].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 [10] 唐力行.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 [11] 孙晓莉.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走向[J]. 教学与研究, 2000, (8).
- [12] 杰弗里·亚历山大, 邓正来. 国家与市民社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3] 刘新成. 日常生活史: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N]. 光明日报, 2006-02-14(12).
- [14] 孙立平. 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5).
- [15] 怀特. 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贫民区的社会结构[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16] 黄宗智.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1).
- [17] 杨善华, 刘小京. 日常生活: 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切入点[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08-6(7).
- [18] 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 [19] Jan Myrdal. 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1965.
- [20] Jan Myrdal, Gun Kessle. China: The Revolution Continued. Harmondsworth; Middle sex: Penguin Books Ltd, 1971, 1970.
- [21] Potter.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2] 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23] 雅克·勒高夫. 新史学[J]. 史学理论, 1987, (1).
- [24] 行龙. 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J]. 近代史研究, 2006, (1).
- [25]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A Review on the Theory of Hi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Rural Society

LI Fei-long

(Institute of Marxism , Guizhou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Guiyang , Guizhou 550004 ,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ountryside, scholars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gradually formed a variety of rural history research perspectives, such a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ramework”, “state and society framework”, perspectives of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basic level perspective, social history continuity, long-term perspective, and the holistic view of history. Systematic summary of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ntemporary rural history will help deepen the studie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contemporary; rural history; theory; perspective